

【书 评】

唯物史观何以成为中国新史学的理论基石？

——以陈其泰主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为中心的解读

邹 兆 辰

(北京师范大学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中心, 北京 100875)

摘 要:如何看待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学术问题,在新的时代里我们要作出新的回答。《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一书对这个问题加以梳理,作出全面的回答,并从历史的角度科学地说明了唯物史观对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唯物史观;理论基石《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11)06-0828-06

近些年,有关史学理论问题的讨论陷入低谷,引起特别关注的理论热点问题越来越少,甚至期刊上探讨宏观史学问题的文章也渐少,学者们更多地关注具体的史学问题。由于史学研究课题的“碎化”,解决问题主要靠史料的考证,提不到历史观的高度。这样,唯物史观被有意或无意地淡化了。这给人们一种错觉,似乎史学研究已经不需要以唯物史观作为理论的基础或指南了。当然那些明确反对以唯物史观指导史学研究的观点不属于这种情况。

要说明唯物史观对于史学研究的指导作用,不是靠简单的说教所能奏效的。唯物史观与史学研究的关系是一个非常严肃、非常重要的学术研究课题,非有原始察终地纵向考察,高屋建瓴地全方位思考,缜密细致地深入研究,去伪存真地辨别分析,不能真正说明两者的关系。为达到此目的,就必须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其诞生以来的主要理论成就进行一次严密的梳理。这种梳理,不是简单的问题罗列,而是要把唯物史观在史学研究中的运用与中国历史学本身发展的内在关系科学地、逻辑地揭示出来。陈其泰先生所主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以下简称《理论成就》)一书,所要

解决的正是这个问题。

首先,具体阐明唯物史观为何能在被传统思想浸染的中国大地上找到生根的土壤。

介绍五四时期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著作很多,但这些著作多是搜寻与罗列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具体情况,却没有真正深入地考察过唯物史观这一在19世纪欧洲兴起的社会思潮为何会在中国找到适合它传播的土壤。我们可以合理地设想:假如中国不存在适合唯物史观传播的土壤,唯物史观就会像当时舶来的各种西方社会思潮一样,成为来去匆匆的过客。然而,唯物史观却在中国学术思想界扎下根来,成为中国20世纪新史学一块厚重的理论基石。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这确实是过去很少有人探讨的问题。

《理论成就》首先提出并引起我们深刻思考的一个严肃问题,就是传统思想的精华何以通向唯物史观?作者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光辉价值正在于‘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遗产是同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相通的,这就成为‘五四’时期以后先进的中国人接受这一科学理论的思想基础和桥梁”^{[1]17}。探讨中国传统思

收稿日期:2011-10-24

作者简介:邹兆辰(1940-),男,福建福州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主要从事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

想文化中的唯物主义因素需要一个专门的课题来完成,因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实在是太博大精深了,但这并不妨碍本课题以适当的篇幅提纲挈领地揭示出这个问题的精义。

唯物史观的哲学基础是承认客观世界中物质的第一性,即从人类物质生产的基础解释历史的进程,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组成的社会结构来解释全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变迁。以这种观点与中国传统思想相对照,可以发现中国历代进步的思想家通过观察自然与社会变迁,也在许多基本观点上得到了类似的认识。作者考察了传统思想中的大量唯物主义思想因素,举出先秦思想家的著作《荀子》、《管子》,西汉司马迁、东汉王充,清代学者王夫之、颜元、戴震等的论述,揭示出中国唯物主义思想家的唯物主义思想发展的路线和他们的战斗精神。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中,辩证法与唯物主义学说密切联系,创造了革命的辩证法学说。在中国的先进思想家中,也有很多关于辩证法思想的深刻论述,尽管他们的表述可能不够系统,但体现了他们对自然界和社会历史进程的辩证运动过程的深刻认识。作者列举了先秦儒家经典《诗经》、《左传》、《论语》、《孟子》、《易传》、《老子》、《孙子兵法》等典籍中所论述的事物的辩证的、发展的观点,引证了贾谊《治安策》、柳宗元《封建论》和清代龚自珍有关事物辩证发展的论述,说明这些观点都是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精神相通的。此外,先秦思想家关于行仁政、民贵君轻的思想,汉代思想家贾谊、晁错、王符、仲长统从封建政权的覆亡中得到的封建政治败坏、对民众残酷榨取而导致王朝覆亡的必然结局的认识,清代思想家黄宗羲、唐甄、龚自珍、魏源等批判专制君主、专制制度,同情民众苦难的言论,无疑对20世纪初期的中国先进人士也是很好的启发,为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思想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同样,儒家经典所描绘的“大同世界”的理想,也必然会使早期共产主义者对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通过阶级斗争建立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制度的理想感到十分亲切,很自然接受并为之奋斗。

《理论成就》一书深刻地指出:深入地探讨传统思想中的精华何以通向唯物史观,对于认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特点,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其一,深刻

地认识中国传统思想发展的方向同样符合人类文明的大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精华是与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相通的,作为人类优秀遗产直接继承者的马克思主义就理所当然地与中国传统思想的精华相贯通,容易为先进的中国人所接受。其二,进一步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创造性发展的深刻意义。由于中国社会本身的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具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条件,而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又提供了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和内在动力,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以后,能够很快地在中国扎根,并形成与中国文化特点相结合、符合中国国情的新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在过去一个世纪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重要原因。第三,能进一步认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造性特点及其科学价值。中国古代史学的优秀理论遗产同样是五四时期进步思想家接受唯物史观的桥梁。20世纪中国一大批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是从小熟读经史的学者,他们受到了传统思想文化的精华的熏陶,所以一旦接受了唯物史观,就会将其与中国传统史学中的优秀理论遗产结合起来,形成具有中国特点的历史学理论,形成中国独特的史学发展的道路。

其次,深入地阐明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如何运用于中国历史研究的核心问题,力图说明这种运用对中国史学所产生的影响。

《理论成就》一书所阐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在该书第二章“创造性运用唯物史观原理的重大成就”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在这一章中,编著者以很多的笔墨来阐述古史分期问题及进行相关理论问题的探讨,阐明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问题的探索情况。

论述古史分期及其相关的理论问题是需要有相当的理论勇气的。首先,这是一个史学理论领域中的老问题,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讨论,到改革开放以后的80年代,对这个问题的介绍文章与著作层出不穷,如果论述没有新意,就会产生“炒冷饭”的现象;其次,古史分期问题以及其他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中所讨论的问题,即所谓“五朵金花”,在上世纪末曾遭到严重质疑,认为这些问题是“意识形态语境中的学术论战”,是一种在“战时史学”体系中产生的、屈从于政治的、非学术的“意识形态诉求”,因而是“假问题”,这些命题本身能否成立早已成为问题。第三,谈及古史分期问题就必

然要涉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即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以及由此引出的“五种生产方式”的表述。这些问题改革开放三十年一直就备受质疑,例如说社会经济形态递进的理论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五种生产方式”的理论是斯大林提出来的,奴隶社会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中国自秦汉以后所经历的社会不是封建社会,等等。面对这种种质疑,许多史学工作者早已不谈社会经济形态问题,避谈“五种生产方式”,当然也有的提出诸多新观点、新概念来取代原来的种种提法,以避免理论上“倒退”、“僵化”、“保守”之嫌。

《理论成就》的编著者正是清醒地看到了史学理论界的这种现状,不避风险,敢于涉及敏感问题,不但理清了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实事求是地介绍了各家的观点,并且力争对于理论上错误、模糊、似是而非的种种言论、观点,哪怕是已经形成“大部头”著作的论点,毫不含糊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对于在理论上正本清源、澄清是非,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一)从学理上阐明古史分期等问题的学术演变史,正面回答所谓“假问题”的真本质,阐明了此类问题的讨论对于中国史学发展的意义。作者指出“古史分期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社会经济形态有序演进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区分它的发展阶段,从总体上把握它的发展规律。因此,古史分期是唯物史观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重要杠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1]79}书中将这个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的讨论分为三个时期:即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古史分期讨论序幕;从抗战到“十七年”,古史分期讨论走向高潮;改革开放以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古史分期讨论又掀新高潮。作者对于每个阶段引起讨论的社会背景、学术背景、代表性论点、讨论的基本走向以及对于当时中国史学研究的影响等问题都作了深入的分析。此外,本书还对于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是否“屈从于政治”的“意识形态诉求”,古史分期的讨论是否“无果之花”,古史分期的讨论是否已经“被时代所取消”等问题作了正面的回答。作者深刻指出:古史分期等问题经过长期讨论后出现退潮和转型是自然的和正常的,它的产生是从总体上把握

历史发展脉络所必须涉及的,是取消不了的。作为古史分期讨论的指导思想的唯物史观,虽然受到种种责难和挑战,但它是推翻不了的。

(二)对于与古史分期有关问题的讨论也从学理上进行了分析。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不是简单的划分历史阶段的问题,由于涉及以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来说明中国历史,所以必然会牵扯一系列相关问题。例如,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问题,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讨论对于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特别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由于这些问题也属于“五朵金花”的范畴,因此也受到质疑,甚至有成为“假问题”之嫌。但如果这些问题都被划归“假问题”,整个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就要完全变样,几代学者在这些问题上所花费的努力必将付诸东流。《理论成就》一书并没有简单地就所谓“假问题”的观点进行“批判”,而是通过“百家争鸣”的方式摆出在这些问题上的不同观点,并以在这些问题上继续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们的新成果来阐明这些问题对于深化中国史研究的重要意义。这种做法是很有说服力的。

(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是否适合于中国史学的研究作出了肯定回答。几十年来关于古史分期问题的争论不仅仅集中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划分问题上,同时也涉及中国历史上是否经历过奴隶社会的问题,这个问题在20世纪20、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中就已提出。继奴隶社会以后,中国是否经历过封建社会、封建社会是否是人类历史必经阶段的问题也被提出,再加上否定中国存在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这样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是否适合于中国历史、五种生产方式的理论是否能够成立的问题就都提出来了。应该说,这些都是当今史学理论领域中的重大问题,不是某一个史学理论研究课题所能单独解决的。然而,回避这些问题则无法说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无法解释唯物史观为何能够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学术界虽然有针对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是否适于中国历史的种种质疑的正面回答,但大多数学者还是避其锋芒,不从理论上去展开争论,以至于回答质疑的声音相对微弱。

《理论成就》一书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不回避质疑,以旗帜鲜明的态度表明在这些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尽管作者也是以一家之言的态度来对种种质疑的观点提出“商榷”,并且也客观地说明了这些问题产生的背景。作者指出:“这些质疑,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是对过去史学界确实存在的教条主义的一种反动,同时也是对古史分期讨论的基础理论的挑战。”过去,马克思主义理论处于“不容置疑”的地位,容易导致思想僵化,问题实质上被掩盖。改革开放以后,原来被掩盖的问题暴露出来,引起反思,出现各种各样的意见,不足为奇。“这种状况,可以促进人们的思考,防止思想僵化,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发展的机遇。”^{[1][122]}因此,该书作者在回答上述质疑时采取两种办法: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问题时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基本观点展开论述,以达到正本清源的目的。如“五种生产方式”的理论是否违背马、恩的原意,“五种生产方式”是否是西方中心论的虚构,马克思是否把“资本主义”当作历史上依次演进的的生产方式之一,马克思是否提出过几种社会形态演替的理论等问题,就必须以马克思本人的论述为基本依据来从理论上作出回答。另一方面,对于像中国历史上是否经历过奴隶社会这样的属于学术讨论范围的问题,则需要以学术讨论的方式来回答。许多从事先秦史研究的学者提出中国历史上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或称为“无奴论”),那么回答“无奴论”的最好方法就是用“有奴论”者的研究成果来进行“商榷”。这种办法虽然不能使问题迎刃而解,但是对于问题的解决,对于促进不同观点的学术讨论是有积极意义的。

通过总结上述问题的讨论作者指出:古史分期及相关问题的讨论实质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有序演进的理论来剖析中国历史过程中出现的不同意见的讨论。尽管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只要承认马克思从各种社会关系中找出最基本的关系——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就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深层秘密,探讨了历史发展的规律,使史学摆脱用政治的或思想的偶然因素任意解释历史的混沌状态,使历史研究成为科学,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基石。

第三,力求说明唯物史观是如何促进中国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问题的全面研讨,逐渐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的。

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以来,史学家们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探讨了许多历史理论问题,产生了很多富有理论价值的学术产品,如李大钊的《史学要论》、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等。但长期以来,大多数史学家们关于历史理论问题的研讨往往与历史实际问题相结合,并没有把历史科学的理论问题当做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看待。出现这个问题与人们在认识上的一个误区有关。绝大多数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除此之外没有特殊的历史科学理论,当然也就不能成为一门学科。这种认识误区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消除。直到这时,史学家们才普遍认识到: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指导思想,但是它代替不了历史科学自身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需要建立自己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才能促进历史科学的健康发展。从那以后,大量的史学概论、史学方法论类的教材和著作问世,积极推进了历史科学的理论建设。

尽管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建设是最近30年的事情,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中诸多理论问题的研究、探讨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就开始了,并且还出现了多次理论问题研究的热潮。总结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诞生以来在理论问题上的探讨历程,梳理有关理论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分析几十年来史学理论建设的巨大成就,澄清近年来在理论问题上的重大是非,回应来自各个方面的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挑战,无疑是一个关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健康发展的具有重大意义的课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一书责无旁贷地承担起这一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由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过程中提出并研讨的问题,所以面对历史的问题必须作出历史的回答。就是说,对于每一个重要的史学理论问题,都要动态地分析它是怎样提出的,有哪些主要的讨论,研讨中有哪些代表性的论述,研讨的发展趋向如何,等等。由此我们既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所涉及领域的宽度,也可以感受到各项问题研讨的历史过程和问题解决的程度。上文我们谈到,关于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以及相关的理论问题的研讨,特别是关于中

国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是本书的重头戏,我们已着重论及。此外,应该提到的还有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和历史进程基本线索的问题,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关于历史评价的理论,关于文化遗产和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关于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探讨,关于史学发展和历史编纂问题,关于史学的社会功能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建设,也直接影响史学研究的实践方向,因此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探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不能不涉及这些问题。

纵观《理论成就》一书对于这些问题的论述,我们至少可以得到这样一些认识:

其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理论探讨方面所涉及的问题是比较广的。既有关于中国历史发展本身的问题,如古史分期问题、近代社会性质问题、中国历史发展规律问题、民族问题等,也包括一些史学自身的理论问题,如历史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探讨、史学发展和历史编纂、历史评价问题、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史学社会功能问题等。这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重视理论问题的传统,尽管没有形成史学理论的专门学科,但不是说对史学理论的问题没有研讨,只要我们认真总结几十年来史学理论探讨方面的这些成果,就可以发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已经构成了体系的,上述这些理论问题的研讨,已经为今天建立和发展历史理论学科奠定了相当雄厚的基础。

其二,中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都非常重视历史理论问题的研究。郭沫若、翦伯赞、吕振羽、范文澜、侯外庐等都留下了大量关于理论问题的论述,是我们今天进一步研究的重要前提。尽管他们的论述不可避免地会带着那个时代的烙印,但他们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们对于许多问题的论述即使在今天对我们也是有启示作用的。

其三,历史理论问题的研究与对历史本身的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没有理论问题的指引,具体问题的研究就失去方向;没有具体问题的研究,理论问题就会流于空泛。新中国成立以来,那些在史学理论的研讨上最活跃的史家,往往也是在历史研究过程中成就卓越的学者。例如,白寿彝先生一贯重视历史理论,在各方面重要问题上都有精辟论述,尤其在历史编纂学方面、在民族关系问题

上、在历史遗产的批判继承等方面都有大量的论述,而他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以及史学史、民族史研究方面的宏富论著,恰恰反映了他史学研究的卓越成果。老一辈史学家的这个好传统,是值得年青一代学者很好学习的。

其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上述各个方面的成就都有其丰富的含义和特定的内容,都不是简单地套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可以解决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本身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完善的,唯物史观代替不了历史科学的专门理论。但是,没有唯物史观原理的指引,史学理论的建设就会失去方向、失去灵魂,也不可能获得这多方面的理论成就。因此,尽管今天史学理论的学科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新理论、新观点、新方法层出不穷,特别是年青一代学人已经有了很大的建树,但传统的历史理论问题的探讨价值不容否定,唯物史观仍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石。

第四,借鉴与吸收:马克思主义史学前进的动力。

《理论成就》表明:近9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在深入探讨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研究历史发展和史学发展的诸多重要理论问题中,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由于几代学者的努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只有少数学者涉足的最初开创,发展成整个中国史坛的主流,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事实说明,只有重视理论问题的研讨,才能更好地促进史学研究的发展。几十年来,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学者对中国历史问题探讨的深度和广度,所提出课题的丰富性,是以往的史学家所不可比拟的。尽管以往的史学家也提出过很多关于历史发展以及史学研究重要理论问题的见解,值得我们很好地研究、继承,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却对这些理论问题作了科学化、系统化的研究,把中国的史学研究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

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是封闭的教条,而是一个开放的学术思想体系,它在历史观的问题上有自己形成体系的独特见解,但是它并不排斥从古今中外一切优秀史学成果中吸取营养,在与中外史学的交流融会中促进史学自身的发展,也促进史学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完善。《理论成就》一书在追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注意到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史学

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在论述史学发展和历史编纂问题时专门论述了中国古代史学的优秀传统特别是在历史编纂上的重要经验,提出如何继承与发扬的问题;书中还用两章的篇幅论述唯物史观与新历史考证学的关系,坚持唯物史观与大力吸收西方新学理的问题。这些内容都充分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对待人类一切优秀思想文化遗产方面的开放心态和所取得的成绩。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书中对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新历史考证学派的成就和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新历史考证学的关系作了十分系统、深刻的研究,并通过大量事实说明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历史考证学所达到的新境界。作者强调,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同新历史考证学派同是20世纪中国史坛两大主流学派。新历史考证学派与乾嘉学者的严密考证有渊源关系,同时又适逢中西学术交流之际会,吸收了西方新学理,运用了大量新史料,因而在考证范围、治史观念和考证方法上,超过了传统考证学,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王国维、陈寅恪、陈垣、胡适、顾颉刚、傅斯年和孟森、钱穆等一批优秀学者,都在各自领域取得卓越的成绩。对于新历史考证学派的成就进行研究是完全必要的,因为他们的史学成就同样是一笔宝贵的学术遗产,需要我们自觉地继承,从中获得借鉴、吸取营养。但是,那种将新历史考证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对立起来,甚至以抬高新历史考证学的地位,来贬低唯物史观对史学研究的指导作用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该书一个显著亮点在于说明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新历史考证学不是对立的,两者之间有密切关系。事实说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于有成就的新历史考证学家所具有的深厚学术功力、严谨治学精神、严密而科学的考证方法、敏锐而通达的历史见识,都给予极高评价,甚至真诚地推崇,把借鉴他们的学术成果、发扬他们的治学精神,视为发展新史学至关重要的条件。而有见识的新考证学家对唯物史观也并不排斥,认为唯物史观重视经济条件构成社会发展的基础,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各项因素互相联系和依存,使社会构成有机的统一体等基本观点,能推进历史研究达到更深刻、更正确的认识。作者还举出新历史考证学者运用系统化、体系化的考证方法,对学术思想史上某些深层次问题的探索,恰好与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学者的研究成果取得了一致的结论。

事实证明,新历史考证学家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以联系的观点分析史实,以“通识”的眼光考辨史料的方法,都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方法相沟通。但是,新历史考证学家的方法是朴素的,没有达到十分自觉的阶段。马克思主义是构成体系的,能够自觉地运用,就能够达到更高的层次,能够更深刻地发现真理。新中国成立以后,新历史考证学家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感到眼前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能够引导自己更加接近真理,学术达到新的境界。徐中舒、谭其骧、唐长孺、史念海等学者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历史考证研究达到了新的境界。例如,有的学者由于运用了唯物史观,对于研究对象达到本质性的认识,从研究具体问题进一步探求历史发展中的规律性问题;唯物史观还推动了新考证学者提出新的研究课题,探索未知领域,更进一步前进;有的学者在坚持学术研究科学性的前提下,更好地发挥了史学服务于社会的功用。作者指出,这些新历史考证学者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具有高度学术价值的成果,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大成就。

《理论成就》一书还研讨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对西方史学新学理的吸收情况^[2]。坚持唯物史观与大力吸收西方新学理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两者缺一不可。不能适应时代潮流,及时了解与吸收西方史学的新发展、新变化,从而改进自己的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就会闭塞、沉闷、停滞、僵化;不坚持唯物史观,不用唯物史观去检验各种史学流派的优劣,一味地跟风跑,就会陷入盲目,从而削弱马克思主义史学。30年来,这方面的教训是很深刻的。只有两方面有机结合,才有助于史学的健康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史学发展的历史证明:开放与吸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前进的不竭动力,过去如此,新世纪也必将是如此。

参考文献:

- [1] 陈其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
- [2] 邹兆辰.开放与吸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不竭动力[J].史学史研究,2011(3).

责任编辑:仇海燕